

博雅史学论丛 中国史

明初的
人物、史事与传说

Mingchu De
Renwu Shishi Yu
Chuanshuo

陈学霖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史学论丛 中国史

明初的

Mingchu De
Renwu Shishi Yu
Chuanhuo

人物、史事与传说

陈学霖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 / 陈学霖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0
(博雅史学论丛·中国史)

ISBN 978-7-301-17792-1

I. ①明…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明代 IV. ①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1365 号

书 名: 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

著作责任者: 陈学霖 著

责任编辑: 张 晗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792-1/K·071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0 印张 310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自序

本书收录的九篇论文，是我在多年来检读原手史料，官方记载，私史杂著，小说稗乘以至民俗资料，去探索明初太祖与成祖朝一些显著的人物、事件在史籍文集记载的异同及呈现的各种样貌，并审视它们如何经过渲染附会在后世继续演绎，产生重大效应的神奇民间传说的过程中撰写而成。主题包括明朝国号的缘起及德运问题、明太祖惩贪“剥皮实草”酷刑的考证、秦王朱棣的罪行及对政治的影响、明清京师的官式祈雨祭礼与民间习俗、明初刘基（伯温）预言传说的产生及演变，包括“八月十五杀鞑子”故事的滥觞及台湾流传的《烧饼歌》、《刘伯温谶》、《救劫碑文》等谶言的考索，以及“真武神·永乐帝”传说的来源、蒙古《大明永乐帝建造北京城》故事的考释、北京外城“哪吒庙”的探溯等。通过考证史料，寻根溯源，辨析真伪流变，这些个案显示官私记叙描绘的歧异，呈现不同时代及层次的历史价值观，并且在时代演变下历史记载与民间想象混合，孕育编造家喻户晓的骇俗传说，展现中华文化中历史与民俗传统交融的特质。

这些论文分别撰作于在美国及香港教学的岁月，最早一篇论“真武神·永乐帝”的传说撰于1995年，最近一篇论明朝国号的起源及德运去年才完成，各篇都曾在香港及台湾的学术期刊，研讨会论文集或单行本论著发表过，不过由于以繁体字刊行及印刷量少，在中国内地并不流通。这次以简体字版汇刊成书，三数篇曾修订内容及补充资料，但大多文章仅更正错误

字句,整齐格式及划一引书版本,并无较大改动。本书荷蒙北京大学出版社惠肯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端赖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盛情推荐,责任编辑张晗先生悉心处理文稿,个人衷诚铭谢。这本书我要敬献给贤妻健梅,感谢她与我结褵四十多载的爱意和在生活与事业上的照顾和扶持。她尽心家计,抚育儿女,使我能游历各地与学界交流,长期专注教研工作,后顾之忧。今日她有个人专业,而长女与二子皆学有所成,各有事业及家庭,荣休以后自觉老怀安慰,深信健梅也珍藏这份共享的喜悦。是为序。

陈学霖 2010 年 8 月 15 日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湖城寓所

目 录

自 序/1

第一篇 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1

第二篇 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酷刑重研

——兼与王世华教授商榷/36

第三篇 明太祖对皇子的处置

——秦王朱棣罪行与明初政治/58

第四篇 明清北京的祈雨与祀龙

——官式祭礼与民间习俗/97

第五篇 刘伯温与“八月十五杀鞑子”故事考溯/144

第六篇 台湾流传的刘伯温预言传说探溯

——《烧饼歌》、《刘伯温谶》、《救劫碑文》及其他/183

第七篇 “真武神·永乐像”传说溯源/213

第八篇 蒙古《永乐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248

第九篇 北京外城哪吒庙探溯

——兼述清代京师绦带行源流/294

第一篇 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

一 开国建元及“德运”的缘起

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上,数千年来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不论是汉族或他族,无论肇创的是割据偏安的王国,或是统御四方的大一统国家,都以定立名号,作为天命所钟、万民拥戴的象征为首务。从现代政治理论而言,这便是彰示政权的 **legitimacy**, 时下中文译作正统、正当或合法性的主要标识。从历史的发展来说,就个别政权而言,它们建立的是国,其名称应是“国号”,但到秦汉以后,由于阴阳五行循环理论建立了政权间的递嬗系统,一国的名号又称为“王朝”。赵翼(1727—1814)《廿二史札记》卷二九载录《元建国号始用文义》一条,将历代国号的缘起分类,近人侯绍文据之概括为六则:(一)因封号以为名;(二)因治地以为名;(三)稽之姓氏以为名;(四)托之前代以为名;(五)夸其权力以为名;(六)沿袭宗教迷信以为名。名号取意各个不同,因此每一政权随而制定的历数、朝仪、典礼皆有不同

象征,呈现个别的政治、宗教传统与意识形态,具有特殊的意义。^①

这些政权除却建立国号,亦相继推定本身在规范历代王朝嬗替的阴阳五行循环理论的“德运”行序,作为历史上的定位,为建立政权的正统或正当性的另一相辅相成的标识。这个理论出于战国齐人邹衍(前305—前240?)的“五德终始”说,认为盈天地间有土、木、金、火、水五种基本元素或原动力,名为“五德”或“五行”,依次运转,从所不胜,称为“五德相胜”或“相克”,周而复始。这一理论不但用于解释自然界的各类变化,还作为说明统治王朝兴衰的缘由。^②秦始皇帝(前221—前210在位)既统一六国,便推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应从水德,色尚黑,以十月为正,数用六为纪。此后历代帝王都循制议定德运,改易旗帜服色,正朔历数,制定朝仪祭祀,符瑞典礼以显示其在王朝更迭的正当性地位。汉高祖(前202—前195在位)再定水德以承周之火德,但朝臣颇以水为秦运而反对,到武帝(前140—前87在位)便更定为土德。其时由于儒生董仲舒(前179?—前104)的倡议,论者将五德的行序修正为木、火、土、金、水,从所相生,称为“五德相生”说。到汉末成、哀二帝之世(前32—前7;前6—前1在位),议者以国运日蹙,酝酿改制,古文经学家刘向(前77—前6)、刘歆(?—23)父子,便以“相生”说推排上古帝王的传授,以伏羲受木德开始,经过三番轮值,汉以火德王作为

① 关于中国古代王朝建立“国号”及推定“德运”,作为政权的正统或正当性标志的讨论,参杜奎英:《中国历代政治符号》(台北:政治大学,1973)第1章;及Hok-lam Chan,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 (1115-123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chap. 2。引文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元建国号始用文义》,《四部丛刊》本,页22上—23下。参杜奎英上揭,页42—52;及侯绍文:《中国历代国号之缘起》,《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0卷第6期(1977年5月),页8—13。

② 邹衍“五德终始”说出所著《主运》等篇,原书已佚,遗文见吕不韦:《吕氏春秋》,《四部备要》本,卷十三,及汉朝人著述与后代类书。近代有关论著甚多,详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顾氏编《古史辨》(北平:朴社,1935)第5册,页543—753;李汉三:《先秦两汉之阴阳五行学说》(台北:钟鼎文化出版公司,1967);王梦鸥:《邹衍遗说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及孙广德:《先秦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政治思想》(1969)(台湾商务1993年修订本)。英文论著参Benjamin I. Schwar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 9; Michael Loewe, *Divination, Mythology, and Monarchy in Ha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s 2, 6; 及Aihe Wang, *Cosm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论据。^① 到王莽(9—23 在位)篡汉立新,便自称以火德传位,定土德为运,并同时采用刘歆作《世经》,依照前说编列古代帝王轮值系统,证明新莽嗣承汉火德居德运正序。但是这个体系缺去秦之水德,与历史事实抵触,根据顾颉刚(1895—1980)的考证,刘歆于是在五运的木、火间另设一水德的“闰位”以安置秦于周汉之间,视为“不当正序”,并在五德的头二循环,分别增置传说中的共工与帝鸞二主的“闰位”,作为秦的先例以自圆其说。至王莽倾覆,光武帝(25—57 在位)兴复汉祚,于是重建火德,黜新莽于“闰位”为僭伪,与居德运正序者有别。经过这几番调整,“五德终始”说与远古历史和当世政治的配合便成定型。^②

从魏晋到隋唐五代,历朝帝王都依照“五德相生”的模式推定德运,俾与所欲继之前代政权相承,建立正当的统绪地位。例如,三国时蜀绍汉为火德,魏称土德,晋代魏改从金德。嗣后南北分裂,割据诸国亦各自议论行序。因此,南朝刘宋称水德以承晋,其后齐、梁、陈以木、火、土德相继。北朝刘赵又从水德以承晋,慕容燕初称水德,后改木德,苻秦继尚木德,姚秦称火德,拓跋魏先定土德,随改水德以承晋,后周则从木德以嗣魏。逮隋文帝(589—604 在位)统一天下,推定以水德继周,及李唐取代,又改称土德越隋以承汉。此后五代诸国亦循制推定德运,如后唐称土德以绍李唐,而后晋、后汉、后周各以金、水、木德相承。^③ 这些政权,一旦议定行序,便随所称之德更易旗帜服色、正朔历数,制定祖、腊祭祀及符瑞典礼以昭明天命所归。所谓祖、腊之祀,始于东汉之世,指五行盛衰之祭日,岁首气始曰祖,岁末气

① 见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六,页237;卷二六,页1260;卷十二,页483;卷二八,页1366、1381、1402;班固:《汉书》(中华,1962)卷一下,页82;卷六,页199;卷十一,页340;卷二一上,页973;卷二五下,页1245、1270。秦汉以下历朝德运行序的推定与演变参王钦若等纂:《册府元龟》(清嘉庆十九年[1814]刊本)卷四《帝王部》,四《德运》,页3上—4下;陈梦雷等编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据雍正原刻影印本),《皇极典》卷一七〇《帝运部汇考》,页3上—4上。近人研究详前揭顾颉刚、李汉三、孙广德及杜奎英专论的有关章节;又参王宇清:《历运与服色》,载《包遵彭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图书馆,1971),页13—46。

② 详《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范晔:《后汉书》(中华,1965)卷一上,页22、24。参顾颉刚前揭,页525—597;详郑雯馨:《论王莽对新朝“正当性”的建立》,(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第20期(2005),页5—38。

③ 以上各朝所推定的德运正史皆有记载。略见《册府元龟》前揭,页4上—15上;《古今图书集成》前揭,页4上—8下。详前揭杜奎英及王宇清论著有关德运行序的章节。

终曰腊,依次推定。根据记载,祖与腊与五德相配之关系为:水、子祖辰腊;火、午祖戌腊;木、卯祖丑腊;金、酉祖丑腊;土、戌祖辰腊,周而复始,循环不绝。^① 赵匡胤以后周殿前都点检篡夺政权,开创宋朝,史称宋太祖(960—975在位),亦按“五德相生”及君王禅让的王朝嬗替模式,推定宋为火德。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960)三月壬戌下载:“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从之。”同一时期,与宋对峙华北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在汉化的影响下,亦运用“五德相生”的模式,推定本国的德运以继承汉人王朝作为中国的统治者。首次在章宗泰和二年(1202),议定金为土德以继宋之火德,其后在宣宗贞祐二年(1214)再次讨论,仍从旧议。^②

金朝是中国史上最后一个讨论德运行序作为政权正当性的标识的王朝。这一方面由于北宋中叶的儒学复兴,在欧阳修(1007—1092)揭橥以《春秋》的“居正”及“合一”大义为《正统论》的主轴,若不符合标准则“正统有时而绝”的“绝统”说影响下,“五德终始”的循环理论对政权转移的解释为道德原则及政治形势所取代。另一方面,继起的蒙古族在中国建立的大汗王朝命名“大元”,取《周易·乾卦》“大哉乾元”或“大大”之义,又与本族 *Yeke Mongghol ulus* (大蒙古国)的名号吻合,而由于其为草原民族开国,政制文化与中土殊异,无须以汉人之德运说建立其正当性。^③ 汉人复国的

① 关于“祖”、“腊”祭祀配于五德的日序参王应麟:《小学紺珠》,《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卷一《五运》,页26。

② 见薛居正等纂修:《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书》(中华,1976),页146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七年[1881]辑本,1986)卷一,页9上。脱脱等监修:《宋史》(中华,1977)卷一,页6。参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载同作者,《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页6—10。金朝的德运议论见脱脱等监修:《金史》(中华,1977)卷十一,页259。卷十六,页355。详 Hok-lam Chan, *Legitimation*, chaps. 4, 5。

③ 关于宋中叶的儒学复兴与五德转移学说的衰退,参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载同作者,《宋史论集》,页125—165;刘复生:《宋朝“火运”略论——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页92—106;及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页177—190。元朝“大元”名号的起源及释义参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汉学研究》第3卷第1期(台北,1985年6月),页23—40。关于蒙元帝国政权的正当性问题,详 Herbert Franke, *From Tribal Chieftain to Universal God: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München: Bayerische Akademie, 1978)。

明朝及满族统治的清朝,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及政治思想与制度之转变,并无讨论本朝在德运转移的行序。

元末两淮民众,不堪蒙古腐败政权的贪敛残暴,在白莲教徒韩山童(?—1351)等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的煽动下,以红巾为标识,蜂起反抗元朝统治。一时豪强并起,逐鹿中原,相继建国纪元,割据一隅。至正十五年(1355),韩山童子韩林儿(卒于1366年底或1367年初)称帝于安徽亳州,立国号名“宋”,崇尚火德,号称恢复赵宋王朝。朱元璋(1328—1398)隶属其下,经过十多年的鏖战,击败群雄,于宋主在瓜步(江苏六合县东南)沉舟身亡后逾年,即元顺帝妥欢帖睦尔(1333—1370在位)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自立为皇帝,国号“大明”,纪元“洪武”,史称太祖(1368—1398在位)。^① 究竟大明的起源及文义为何,又如何处理德运行序,官方诏书并无道及,因此明人众说纷纭,无一定论。1941年,北京清华大学的年轻讲师吴晗(1909—1969),在《清华学报》发表《明教与大明帝国》论文,推论韩山童本为明教徒,“明王出世”说出自摩尼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为大明国号的本源。此文轰动一时,影响甚大,数十年来中外学者纷纷翕从。不过自1980年代起,学者开始质疑“明王出世”说是否来自明教,而杨讷撰《元代白莲教》寻溯其源于释典,认为“大明”国号应来自白莲教徒诵读的净土宗经典如《大阿弥陀经》,否定吴晗的假设,产生新的评估。^②

笔者《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一文,于终篇曾略叙元末徐寿辉

① 关于朱元璋的崛起与创立明朝的经过,官修史籍主要为宋濂等纂修:《元史·顺帝纪五》(中华,1978);姚广孝等监修:《明太祖实录》(简称《实录》)(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卷一至卷二九;及张廷玉等纂修:《明史·太祖纪一》(中华,1976)。其他史料摘录见杨讷与陈高华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简称《元代农民战争》)(中华,1985)下编(第4册)。大事年表见孙正容编著:《朱元璋系年要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近人著述以和田清:《明の太祖と紅巾の賊》,《東洋學報》第13卷第2号(1923年7月),页278—302;及王崇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策略之转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1分(1942年5月),页55—69为代表作。英文论著可参Teng Ssu-yu撰传,载*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ed. L. 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简称DMB)(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1, pp. 381-9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part 1, ed. F.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 1, 及所揭书目。其他有关朱元璋的著述见页6注②。

② 见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1月),页49—85;重刊同作者,《读史札记》(北京:三联书店,1956),页235—270。评论见杨讷:《元代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1983),页189—216;又参同作者,《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2004)页176—183。

(?—1360)及韩林儿政权皆取“宋”为国号而朱元璋弃“宋”改立“大明”为号,但未深入分析。随后大陆学者刘复生及刘浦江皆征引拙作,申绎“五德终始”说在宋以后的浸衰,亦旁及明朝的国号与德运关系,然亦未进一步发挥。本篇以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为焦点,着重爬梳考核原手史籍及释典记载,并检讨近现代学者对明国号问题的释义及论辩,为此议题作一整体评论,庶几增进对元明之际史事的了解,并阐释群雄试图建立正当性政权的过程。^①

二 明太祖开国的历史背景

朱元璋出身安徽临濠(今凤阳市)贫农,早年遭天灾家变,栖身皇觉寺,皈依佛门,后乘两淮民众在白莲、弥勒教的倡导下起义反抗蒙元暴政,投军郭子兴,及其侍奉韩林儿宋国政权,脱颖而出,翦灭地方豪雄及元朝而开国的事迹,明修《元史》及《明太祖实录》等官史已有详细记载。不过官书对前朝史事有政治忌讳,常肆缘饰或甚至曲笔,需要勾勒权衡《庚申外史》、陶宗仪《辍耕录》、叶子奇《草木子》及俞本《纪事录》等元末明初的私史野乘,爬梳考核始得真相。清初钱谦益(1582—1664)纂《国初群雄事略》及《太祖实录辨证》,与潘怪章(1626—1663)撰《国史考异》及民国王崇武(1911—1957)著《明本纪校注》皆有重要发明,近人论述元明史事莫不以为津逮。史料摘录见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讷与陈高华编辑之《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四册。^②今据史籍记载及时人论述,朱元璋的

① 本文论旨部分采自拙作:Hok-lam Chan, "The 'Song' Dynasty Legacy: Symbolism and Legitimation from Han Liner to Zhu Yuanzhang of the Ming Dynast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 1 (June 2008): 91-133。中西史学取向不同,表述方法各异,二文的若干论点可以互相补充。

② 这些元末群雄起事记载的摘录见《元代农民战争》上、中、下编,包括《元史》、《明太祖实录》、《明史》,及权衡《庚申外史》、叶子奇《草木子》、陶宗仪《辍耕录》,及俞本《纪事录》等。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及《太祖实录辨证》,与潘怪章《国史考异》及王崇武《明本纪校注》四书对明初史事的考证详下注。近代史学对朱元璋的论著甚多,主要传记为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修订本);吕景琳:《洪武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陈梧桐:《洪武皇帝朱元璋大传》(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其他论著参朱鸿:《近十年来(1989—2000)有关朱元璋研究的介绍》,《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2月),页28—44;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研究中心编:《明太祖及其时代论文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2006年)。英文论著见 *Long Live the Emperor! Uses of the Ming Founder across Six Centuries of East Asian History*, ed. Sarah Schneewind (Minneapolis, MN: Society for Ming Studies, 2008)。

开国事迹与本题旨有直接关联的有以下数点：

首先，元末蜂起反抗蒙古的武装组织有两种号召，在宗教者为白莲、弥勒教之“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的千禧年口号；在政治上则为兴复汉族统治，而其具体的表现为重建赵宋王朝，这两种号召很快结合在一起，成为北派“红巾”之反元运动的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1367，人称宋刘光世[1089—1142]之后）于至正十一年（1351）在安徽策动民众起事的资源。《元史·顺帝纪五》是年记：“五月……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江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元史·河渠志》又载：“先是岁庚寅（1350），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贾〕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①以上史源同时人权衡《庚申外史》、陶宗仪《辍耕录》及叶子奇《草木子》等私史又有补充。《草木子》言：“从之者殆数万人，以赵宋为名。韩山童诈称徽宗（1101—1125 在位）九世孙，伪诏略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盖以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日本〕，托此说以动摇天下。”由此可见，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弥勒教徒以恢复大宋王朝为争取民众支持的同样重要的口号。^②

① 关于韩山童及刘福通抗元事迹见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简称《事略》；中华，1982）卷一；《元代农民战争》第1册，中编，刘福通、韩林儿部；《元史》卷四二，页891及卷六六，页1645。刘福通事迹详见页9注①所揭资料及研究论文集。关于白莲教的历史及其教徒参与抗元战斗的经过详见页5注①引和田清及王崇武论文，及页5注②引杨讷关于元代白莲教的研究。英文论著见John W. Dardes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essianic Revol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3 (August 1970): 539-558; Daniel L. Overmeyer, *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 5; B. J.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 1992), pp. 115-123.

② 参叶子奇：《草木子》（中华，1959）卷三上《克谨篇》，页50—51；权衡：《庚申外史》，见任崇岳：《庚申外史笺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页58—59；陶宗仪：《辍耕录》（中华，1959）卷二九，页356。

其二,根据《元史》及同时人记载,刘福通与韩山童皆为白莲教徒,以烧香惑众、头裹红巾为标识,因此其部众称为“红巾军”或“香军”。“红巾”作为白莲、弥勒教徒的教帜,因为弥勒佛所放光芒为红色,而红色象征火德,又为一般秘密教派祭祀的共同对象。其所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系出净土宗经典教义,盖因南宋以来白莲、弥勒教已采之为诵读的经典。例如“弥勒佛下生”说出《佛说弥勒下生经》,而“明王出世”之“明王”亦屡见释典。据下揭杨讷论文引述《大阿弥陀经》,阿弥陀佛为“诸佛光明之王”,故此释氏的“明王”应从此出。(按此文系驳斥吴晗扭曲史料,谓韩山童及其徒众胥属明教徒,明初史官修《元史》隐讳朱元璋承大小“明王”之后,因饰词称韩氏为明教徒,“明王”应出摩尼教经卷《大小明王出世经》[按应作《小大明王出世[经]》],亦为“大明”国号的来源,详后。)①至于《元史·顺帝纪》所言韩山童诈称宋徽宗八世孙(《草木子》作九世孙),据叶子奇评语系利用当时谣言“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词以煽动人心,因此“贫者翕然从乱,声势浩大”。(按宋广王赵昺[1278—1279在位]走崖山,溺死其下而宋亡是事实,史乘亦称丞相陈宜中出走谋求外兵勤王,但并非往日本,而系往安南、占城,最后死于暹罗。②)事实上,当日反元运动颇多援借宋朝国号作号召,并不限于韩山童辈。《元史·顺帝纪五》至正十二年(1352)五月下载:“庚辰,监察御史彻彻帖木儿等言:‘河南诸处群盗,辄引亡宋故号以为口实。宜以瀛国公子和尚赵完普及亲属徙沙州安置,禁勿与人交通。’从之。”③可知当时中原汉族的人心趋向与元朝官方的应对策略。

其三,韩山童遇害后,刘福通随即于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率部属奉迎其子韩林儿(自称徽宗九世孙)即皇帝位,号“小明王”,立国号名宋,建都安徽亳州,建元“龙凤”,在位十二年始以覆舟身亡为朱元璋取代政权。

① 参见页5注②引吴晗及杨讷等论著。

② 参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页50;《元史》卷四二,页900。宋广王走崖山溺死及陈宜中走安南谋勤王事迹详陈学霖:《宋遗民流寓安南占城考》,载同作者,《宋史论集》,页339—369。

③ 见《元史》卷四二,页900。关于元末群雄起事抗元引用赵宋口号及德运象征,参陈高华:《元末起义农民的口号》,载同作者,《元史研究论丛》(中华,1991),页257—267;相田洋:《红巾考——中国に於ける元於民間武裝集團传统》,《東洋史研究》第38卷第4号(1980年3月),页54—63。

韩林儿立国号名宋,显然是继承父业,以恢复大宋王朝为号召及建立其统治的正当性,与其他草莽英雄有别。韩林儿史料匮乏,事迹不详,看似未有具体能力,或为有名无实的皇帝,而宋国军政系由刘福通把持,不过一切政令俱由皇帝名义而出,以弘扬大宋为政权的使命。^① 因此,当刘福通挥军征讨元廷时便高举大宋的旗帜,如龙凤二年(至正十六年[1356])底,遣将分略河南、山东、河北等地,曾大书旗联曰:“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朱元璋既为韩氏政权一分子,亦萧规曹随。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1358])十月,率军克浙东婺州,奉旨设浙东行省于金华府,随在省门竖立二大黄旗,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开]大宋天。”牌上又书:“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拥护朱氏的地方儒士,如叶子奇便曾上书建言,如要恢复宋太祖、太宗二祖(960—975,976—997在位)之治,需要推行八项政教人事经济改革,可见“大宋”名号在民间的号召。^② 还须注意,这些以红巾裹头,有红巾军之称的战士,虽然代表白莲、弥勒教的信仰,但韩氏政权以宋为国号,以兴复大宋为鹄的,宋以火德为运,故此“红巾”亦有表彰赵宋德运之意。因此其象征意义并不限于宗教,两者合一,由是大大扩张其号召力。事实上,朱元璋亦从韩宋政权崇尚火德,《皇明本纪》载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年(1360)与陈友谅(1320或1321—1363)在龙湾交战时,其士卒绛衣,行军时举火为号,而刘辰(1335—1412)释云:“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将士战袄、战裙、战帽、旗帜皆用红色”,自有其特殊意义。^③ 近人研究元末群雄史事,囿于成见,过分强调明教的影响,认为此种阴阳五行的玄学解释不符实际,实是忽略当时的政治背景与意识形态。

① 韩林儿及刘福通事迹见《事略》卷一;《元代农民战争》第1册中编,刘福通、韩林儿部;《明史》卷一二二,页3681—3686。又参John W. Dardess撰传,DMB, vol. 1, pp. 485-488;金元山、戴鸿义:《韩林儿简论》,《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页61—64。刘福通事迹的研究详《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刘福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界首市人民政府,界首市政协编(合肥:黄山书社,1996)所收论文。

② 见《事略》卷一,页16引《秘阁元龟政要》;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页342;俞本:《纪事录》,见张大同编:《明兴野记》(天启丙寅[六年(1626)]序刊,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卷上,页4下一5上。又参叶子奇:《静斋文集》,载《事略》卷一,页28。

③ 参王崇武:《明本纪校注》(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重印),页74—75;刘辰:《国初事迹》,张海鹏编辑:《借月山房汇钞》本(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1967),页20下一21上。

其四,当日角逐中原英雄以“宋”为国号者,并非始于韩林儿,早在至正十一年十月,在湖北蕲水称帝的淮西南派红巾领袖徐寿辉,已用“大宋”为名号。不过明修《元史》却称徐氏国号名“天完”,改元治平,在位十年,于至正二十年为部属陈友谅所杀。陈建立大汉政权,四年后亡于朱元璋。“天完”之义甚玄秘,时人杨讷揣测内文暗藏“大元”二字,有“誓压大元”之意,不过缺乏佐证。实则徐寿辉取“宋”为国号,据史树青的揭示,始见于宋濂为徐氏部属江东元帅、后降于朱元璋为“怀远大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的于光(字大用[1328—1370])撰述的墓志铭。志文有言:“会元政大乱,天下兵动,江东西化为盗区,分宁徐寿辉建伪号宋,都九江”,明确记载徐寿辉政权的名号。^① 但最权威的证据是1982年在重庆市江北出土,记载继承徐氏政权、信奉明教的大夏国太祖明玉珍(1329—1366)的墓志铭《玄宫之碑》。此碑立于大夏天统四年(1367),碑文首言:“岁庚辰(1350),淮人立徐主称皇帝于蕲阳,颁万寿历,建元治平,国号宋。”这里说明徐寿辉系在至正十年建国,比《元史》所记早一年,而其以宋为名号较韩林儿政权立者早五或六年,又无证据显示其后改名“天完”。^② 然则,《元史》何故杜撰其名以掩盖徐寿辉的国号?此问题与朱元璋在从雄时隶属小明王韩林儿,视宋政权为正统有关,因为若果史乘显示徐寿辉早于韩林儿建国已称宋国皇帝,则韩宋政权便被视为僭伪,这对朱元璋的政治地位会有严重打击。况且,朱元璋在登基为“大明”皇帝后,讳避其曾侍从韩氏龙凤政权,宋国的名号成为禁忌。因此,《元史》窜改徐氏宋政权为“天完”以淹没其实,与这些政治变化有显著的关系。

最后,需要注意,朱元璋于1355年在郭子兴卒后,即被刘福通邀请加入

① 见杨讷:《释天完》,《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页66;史树青:《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铜印》,《文物》1972年第6期,页12—13,注3。徐寿辉立国号名宋证据见宋濂:《宋学士文集·翰苑前集》,《丛刊》本,卷三,页12下。

② 徐寿辉起事经过见《事略》卷三;《元代农民战争》中编第1分册徐寿辉部分;传记见《明史》卷一二三,页3687—3689;Romeyn Taylor撰传,DMB, vol. 1, pp. 600-602。明玉珍建立大夏国事迹见《事略》卷五;《元代农民战争》中编第2分册明玉珍部分;传记见《明史》卷一二三,页3701—3703;John W. Dardess撰传,DMB, vol. 2, pp. 2069-2073。明玉珍墓碑见刘孔伏校:《玄宫之碑》,载《明代史研究》(东京),第12号(1984),页:21—29。详细考证见刘孔伏、薛新力:《谈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年号和国号——附录“玄宫之碑”碑文》,《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页47—50。又参胡昭曦:《“明玉珍玄宫之碑”初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页58—63。

小明王韩林儿的宋国为左副元帅,基于利己形势考虑随即应允。自此在宋国的名义下征战各方豪雄及元朝军旅,扶摇直上,在江南地区成为龙凤政权的支柱。虽然由于朱元璋开国后讳言隶属韩林儿,官吏多所掩饰,如《明太祖实录》回避朱元璋接受副元帅之职,而言其以“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一语却之,但其实反是。嗣后朱元璋的军政任命及封爵都是出自宋国皇帝名义,征战驻防皆是竖立大宋的旗帜作为正当性的象征,借此建立超越于地方豪强的地位。^① 朱元璋升迁迅速,1356年三月任宋国行枢密院同佾,同年七月任新成立的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七年(1357)五月晋江南行省左丞相,所有职位皆由皇帝任命。不过官吏避讳,并无提到宋国皇帝之名,但以“亳都升上为……”或“诸将奉上为……”代称。亳都为宋国都,政权的中枢,而“上”指朱元璋;所谓“诸将奉上为……”云云,固系称帝后的尊称。至于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年在应天〔南京〕击败陈友谅后,势力日张,俨为独立政权,其官爵升迁仍然出自宋国皇帝任命,但《实录》掩饰如故。例如二十一年(1361)正月,朱元璋封吴国公,记载称“诸将奉上为吴国公……”,删除皇帝封赠之语。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迁中书省右丞相,而二十四年(1364)又封吴王,《实录》亦言“李善长、徐达等奉上为吴王……”,如出一辙。^② 但事实上,无论其权力如何独立,朱元璋仍然以宋臣自居以维持其地位的正当性;自当上吴王后,檄文皆书“皇帝称旨,吴王令旨”,表示奉皇帝名义行事。到二十六年冬(1366年12月至1367年1月),韩林儿与刘福通应邀赴应天,在廖永忠(1323—1375)护卫下于瓜步沉舟身亡,改元吴元年以为过渡时期,始将令旨改署“奉天承运,吴王圣旨”,俨以皇帝自居。^③ 《庚申外史》称韩林儿之死系“遇风浪掀舟”,谅是当日官方的说法。

① 见《实录》卷三,页30;参俞本:《纪事录》卷上,页4下—5上。考证详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载《牧斋初学集》,《丛刊》本,卷一〇一,页6下—7上;潘怪章:《国史考异》,《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1995)卷一,页12上—13下;30上—31下。关于朱元璋对韩宋政权的态度,参杨讷:《龙凤年间的朱元璋》,《元史论丛》第4辑(1992),页196—229;又参李新峰:《朱元璋任职考》,载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页141—167。

② 见《实录》卷四,页45;卷十四,页175;参俞本:《纪事录》卷上,页6下—7上,14下,18上。考证详潘怪章:《国史考异》卷一,12上—13下;又参李新峰:《朱元璋任职考》,页439—447。

③ 朱元璋檄文署名“皇帝称旨,吴王令旨”今存二篇,署名“吴王圣旨”者一篇,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台湾学生影万历十八年[1590]刊本,1965)卷八六,页1上—1下,12下。“奉天承运,吴王圣旨”原件载朱升:《朱枫林集》(合肥:黄山书社,1965)卷一,页1。